



LANDSCAPE DESIGN

A Cultural and [美] 伊丽莎白·巴洛·罗杰斯 著
Architectural History 韩炳越 曹娟 等译
彭重华 主审

世界 景观设计 文化与建筑的历史

(精装本)

中国林业出版社

LANDSCAPE DESIGN

THE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TRINIDAD AND TOBAGO

世界

景观设计

THE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TRINIDAD AND TOBAGO

2000

TU98/1103

世界景观设计 (精装本) LANDSCAPE DESIGN

文化与建筑的历史
A CULTURAL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景观设计 / 韩炳越, 曹娟主编.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038-7334-8

I. ①世… II. ①韩… ②曹… III. ①景观设计—建筑史—世界 IV. ①TU986.2-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20072号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Landscape Design: A Cultural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y

Copyright (c) 2001 Elizabeth Barlow Rogers

Published in 2001 by Harry N. Abrams, Incorporated, New York

(All rights reserved in all countries by Harry N. Abrams, Inc.)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c) 中国林业出版社

本书中文简体版经Harry N. Abrams, Inc. 授权由中国林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本书图和文字的任何部分, 事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或任何手段转载或刊登。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3-5588

中国林业出版社 · 建筑与家居出版分社

出版咨询: (010) 83143569

出 版: 中国林业出版社 (100009 北京西城区德内大街刘海胡同7号)

网 站: <http://lycb.forestry.gov.cn/>

印 刷: 北京卡乐富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中国林业出版社

电 话: (010) 83143500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

开 本: 889mm × 1194mm 1 / 16

印 张: 33

字 数: 200千字

定 价: 368.00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我爱的人



译审者的话



《世界景观设计（精装本）——文化与建筑的历史》是〔美〕伊丽莎白·巴洛·罗杰斯用了10多年时间，收集整理世界上从史前到现在能充分体现人类文化价值的城市公园和景观资料，并实地考察了世界上大量的著名公园和景观后，撰写而成的一部巨著。在这部巨著中，她尊崇神圣的史前景观—石篱和诺索斯“迷宫”；探寻古希腊人仰仗自然建设神庙的原理；解析古罗马和意大利文艺复兴创建离宫—别墅的概念；诠释伊斯兰园林和中世纪园林悠静隐喻天堂的理念；展现皇家园林(故宫、凡尔赛等)和贵族园林(斯陀园、斯托海德园等)的风采；推介景观主题公园、艺术园林和大地艺术品服务大众的动机；分析希腊城市、文艺复兴罗马城市和十七世纪法国城市规划设计的缘由；引领现代园林、城市景观、运动景观、文化自然景观所追求的融合人的文化思想、科学技术与自然、景观、城市于一体的思想时尚；全景奉献世界景观设计的时空旅程。

当中国林业出版社把从美国哈利·N·阿布拉姆斯出版公司引进的《世界景观设计（精装本）——文化与建筑的历史》英文版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被这本装帧优美、图文并茂、全景展现人类世界景观设计的巨著而震惊；为它的优雅文字、深邃莫测的意境而茫然，为它能解惑为什么世界会存有雅典卫城、凡尔赛、巴黎城市、迪斯尼乐园等世界性景观的缘由而欣喜。

本书是设想人类在自然界中存在的任何事物均起源于思想、文化的构成来分析景观设计，而不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来分析景观的生成。不管反映的是深厚的宗教迷信、经济动机，还是一闪而过的幻想，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总是蕴含在特定历史时期盛行的某些人群的文化价值观中。人类的意识形态有力地引导了思想潮流，塑造空间的手通过设计赋予场地以意义。景观设计师尝试给自然赋予秩序和意义，为不同的地点给予不同的表现形式，以提高该地的显著程度。他们追寻这些流过时空的思想，并考察

影响景观设计的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文化基址。

从根本上来说，景观设计是处理人与场所之间的关系，一种艺术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日益成为艺术、自然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艺术与技术有改变自然的能力，景观设计在艺术的浸染下遵循着生命生长消亡的自然法则下发展着。世界景观设计的历史必定是一部人类文化的历史，这也正是贯穿全书的理念所在。

本书不是简单地介绍某位景观设计师、某处景观，而是在详细阐述时代背景、文化、哲学、宗教特点的基础上，发掘相应的景观设计理念，并由此展开一个时代景观设计的特点，而这种理念又会对其他时代、地区产生影响，再衍生出新的变体。

时间范围跨度大、地域范围广阔、涉及众多设计师是近年来相关书籍难以比拟的。本书从人类文明开始，直至20世纪末期，涵盖了人类景观发展的各个阶段；各国可考的景观作品均收录其中；景观历史上可圈可点的人物汇集于此，可读可查。

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景观设计历史，涵盖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对景观发展有所贡献的各个国家，并论述了中国与西方文化间的交流和互相影响、互相渗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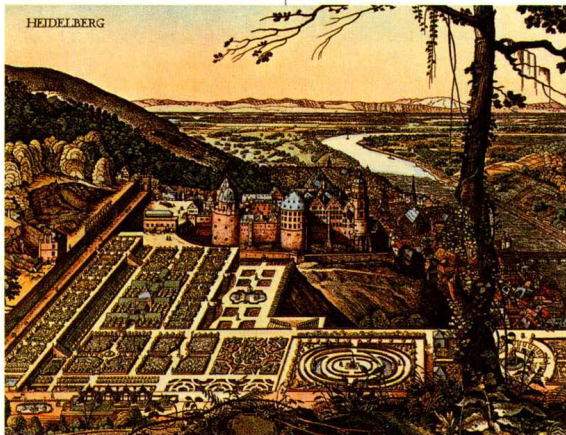
作者参考了哲学、文化、考古学、考古天文学、物理等相关知识，引证的资料浩如烟海。作者的语言驾驭能力极强，文字如行云流水，表现出很高的专业造诣。相对于作者渊博的知识和详尽的叙述，则暴露出译审者的知识欠缺。我们在翻译审阅时，一方面觉得缺少相关背景知识，一方面文字表达能力有限，不能完全反映出作者思想的深邃，只求尽量准确表达。但限于水平和时间等因素，错误缺点均在所难免，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教。

译审者
2015年1月



前言

FOREWORD



在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和卡尔福特·沃克斯(Calvert Vaux)的创新性思想指引下而建成的中央公园，是美国公众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作为公共游憩场地的民主性尝试，中央公园可以说是十分成功的，1979年，市长爱德华·I·考奇(Edward I Koch)任命我为第一任中央公园园长，高登·J·戴维斯(Gordon J Davis)专员帮我建立了中央公园资源保护管理处，此时，前人的成就似乎成了鞭策我管理公园和重建公园的工作动力。1980年初以来，管理处工作人员和公园管理与恢复计划的顾问在进行他们的研究时，我就想更好地理解包含了中央公园在内的整个景观的传统文化，还有更多的在此之前和之后的景观设计的历史。

此间，我读了一些有关于园林史方面的书籍和文章，这些要归功于伊丽莎白·布莱尔·麦克道高(Elizabeth Blair MacDougall)的工作，她是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C.)丹巴顿·奥克斯(Dumbarton Oaks)景观研究项目的负责人，还有她的继任者约翰·迪克森·亨特(John Dixon Hunt)，他现任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景观建筑与区域规划系系主任。作为国际季刊《园林与景观设计史研究》(原名为《园林史杂志》)的编辑，亨特教授通过他自己的作品与学术活动，积极地推动景观设计历史的研究，组织研讨会、发表论文以及撰写专著。经过麦克道高、亨特(Mac Dougall, Hunt)以及其他几位现代景

观建筑史学家的工作，景观设计史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成绩。戴维·考芬(David Coffin)首先在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把景观设计史作为艺术史的一个分支来研究，他们纠正了随意的假设，重视了以前被忽略的领域。然后，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带来了许多新的信息，这些信息需要加到一种综合性的、对风格与时代的比较之中，于是提出了一种对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景观设计文化价值的理解。

随着景观研究领域中的重大学术成就的出现，有关城市主义(Urbanism)的新的著作也发表了。斯拜罗·考斯托夫(Spiro Kostof)是一位杰出的作者，他激发了人们把城市作为一个巨型规模的、长时期的景观项目来理解。通过读他的以及其他作者的著作，我开始看到了城市、公园、花园之间的相互影响，把它们作为一个设计理念的统一体；景观的三个范畴几乎都是统治地位时代精神的主体。

不论何时何地，反思对宇宙的理解、使自然变得更加完美，以及使物理环境更加秩序化几乎都是人类最强烈的愿望。为了能更好理解景观中反映的社会文化精神实质，我读了历史、哲学以及某些重要的文学著作。通过阅读这些领域文献，我更加坚定了关于我们所见的、存在自然界中的任何事物起源于人类思维、文化的构成的设想。不管这些事物反映的是深厚的宗教迷信、经济动机，还是一闪而过的幻想，艺术总是蕴含在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文化价值观中。意识形态有力地引导了思想潮流，塑

造空间的手通过设计赋予了场地新的含义。这种在环境建设中融入思想的做法有时是有意识的，但大部分时候则是无意识的。所谓乡土景观，比那些艺术家努力想反映日常生活而建造的作品在文化方面更具有代表性。

在开始这次思想之旅的时候，我得到了家人和朋友们的鼓励，他们都听过、读过，以及建设性地批评过我的想法与理念。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丈夫—泰德(Ted)，为了帮助我写作，他调整了自己休假与旅行的时间，而且他一直在倾听我理解上的闪光点与理念上的摸索。然后，我还要特别感谢四位著名的史学家，他们的友情与对我工作价值的信任给予我很大的帮助。他们是弗朗西斯·H·肯尼迪(Frances H. Kennedy)、罗格·G·肯尼迪(Roger G. Kennedy)、海伦·列夫考威茨·霍洛维茨(Helen Lefkowitz Horowitz)以及丹尼尔·霍洛维茨(Daniel Horowitz)。尤其是弗朗西斯·H·肯尼迪，她是一位著名的资源保护论者，是她给了我宝贵的建议并且告诉我谁会有帮助。海伦·霍洛维茨提供了经济资助，在出书收益看起来不是十分明朗的情况下，她一直支持我直到书的出版。在成书之前，她读了书稿，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改进了书的结构和写作方式。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奈德·O·高曼(Ned O Gorman)，他用一个诗人的耳朵和造园家的眼睛阅读了本书的几个章节。

另外一位朋友是纽约大学艺术史教授、多本建筑学方面图书的作者—卡罗尔·科林斯基(Carol Krinsky)，他仔细阅读了本书的最后清样稿。他在慎重地考虑了我想成为他的“学生”的恳求之后，成为本书的另一编者，他在书稿的页边用铅笔写下了大量的评论与疑问，使我不得不再次客观地审视自己的论点。弗吉尼亚大学建筑学院(University of Virginia School of Architecture)教授卢本·林内(Reuben Rainey)也全面地阅读了我的书稿，并对书稿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建议。我十分感谢这两位教授的良苦

用心与慷慨相助，而且还要说明的是，他们像其他帮助者一样，对本书中仍然存在的错误完全无关。

声明同样适用于其他数位学者。他们分别阅读了书稿中他们擅长领域里的章节。第一章得益于埃及学者帕特里克·卡尔顿(Patrick Cardon)的见解与思想。在这一章的另外一次审阅当中，我要感谢戴维·赫斯特·托马斯(David Hurst Thomas)，他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的北美考古学馆馆长，还有他的妻子兼助手洛朗·彭德列顿(Lorann Pendleton)—奈尔斯·奈尔逊北美考古实验室(Nels Nelson North American Archaeology Laboratory)主任。我要感谢他们无私的奉献知识和对我书稿提出的建议，以及他们对于美国本土景观的卓越见解。我还要十分感谢我的朋友戴夫·沃伦(Dave Warren)，他是圣塔·克拉拉·普韦布洛(Santa Clara Pueblo)成员，他也阅读了本书稿的第一章，并且拓宽了我对于知觉维度的认识 and 对于史前、远古及当代美国景观建设的宇宙论基础的理解；还有克里斯坦·维莱拉(Khristaan Villela)，融化艺术史中心(Thaw Art History Center)主任与圣塔·费学院(Santa Fe)的副教授，他对我的书稿提出了创见性的意见并给予评论。普韦布洛(Pueblo)建筑史学家瑞娜·斯温泽尔(Rina Swentzell)，她不仅阅读了这一章书稿，并提出了许多意见，而且还与我分享了她对美国自然风光的神圣理解，而并不局限于几个重要的场景。我要感谢布拉德利·T·莱泼(Bradley T. Lepper)，哥伦布(Columbus)的俄亥俄史学中心(Ohio Historical Center)的考古主任，是他把我介绍给南俄亥俄的“筑堤人”(Mound builder)。圣塔·费的新墨西哥博物馆—印第安艺术与文化分馆(Museum of Indian Arts and Culture)主任杜恩·安德森(Duane Anderson)，他对我关于史前和现今美国文化部分的文字进行了审定；该馆人类学室馆员劳拉·侯德(Laura Hold)在美国考古的相关材料方面给予了指导。作家、艺术家与环境资源保护论者尼克

斯·斯塔夫洛拉季斯(Nikos Stavroulakis)在我考察访问克里特岛的米诺阿遗址(Minoan Sites)时,给予了热情的接待。

我要感谢长滩(Long Beach)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艺术史兼古典人类学教授彼得·J·郝利迪(Peter J. Holliday),他对本书第二章进行了细致的、建设性的审读。在古典学者阿维·沙龙(Avi Sharon)的陪同下,我第一次看到了雅典卫城和广场(Athenian Acropolis and Agora),他为我提供了许多对这些重要地址的历史与文化内涵深入理解有用的知识。第三章得益于斯蒂文·莫里(Steven Murray)的审读,他是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艺术史教授和著名的中世纪史学家。还有两位伊斯兰教徒的帮助:康乃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景观建筑系访问教授D·费尔彻德·卢格斯(D. Fairchild Ruggles),以及查扎姆学院(Chatham College)景观研究室主任贝胡拉·沙(Behula Shah)。所有这些专家不惜时间和精力给我耐心的指导,使我受益匪浅。

盖·沃尔顿(Guy Walton),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美术教授,法国文艺复兴时期至十七世纪花园方面的权威和作家,他审阅了本书的第四、五章,为之改进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被我视为无价之宝。特雷西·厄里奇(Tracy Ehrlich),科尔盖特大学(Colgate University)艺术史副教授,她是意大利别墅花园方面的专家,在对这两章的审读中,也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玛格纳斯·奥劳森(Magnus Olausson),瑞典皇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Sweden)的馆员,他阅读了第六章卓庭霍姆宫花园(Drottningholm Palace gardens)部分,并且热心地与我见面,扩宽了我对于瑞典花园设计与欧洲其他国家花园设计关系的整体看法。我还要感谢列娜·洛夫格伦·厄普萨尔(Lena Lfgren Upps ll)和玛丽·埃德曼·弗朗森(Marie Edman Franzen),她们在同我一起参观卓庭霍姆宫花园的过程中与我探讨了关于瑞典花园设计的理论与方法。

景观建筑师约瑟夫·迪斯旁齐奥(Joseph Dispozio),纽约市公园处(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Parks)的前工作人员,也是我199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景观设计史时的助教,现在是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的景观建筑学副教授。他的关于法国如画式(French Picturesque Style)花园的知识(也是他的论文题目)以及他对第七章批判性的审读给我的帮助很大。彼得·佛格森(Peter Fergusson),维利斯里学院(Wellesly College)的艺术史教授,对于这一章也给了我一些很重要的建设性意见。

我还要感谢肯道·H·布朗(Kendall H. Brown),长滩(Long Beach)加州大学艺术系副教授、麦克米兰(Macmillan)艺术辞典的前任编辑,他以一个研究东亚方面专家的视角审读了本书的第八章。约翰·梅杰(John Major),东亚学学者、作家、选集编著者、一本世界文学指导书的作者之一,他也阅读了第八章,同时,他在中国和日本的语言与文化方面的知识对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并且,他对某些诗和小说的看法使我更加明确认识到景观与文学的关系,也提升了 I 阅读这方面文献的乐趣。大阪大学(Osaka University)的环境规划副教授肯基·瓦口(Kenji Wako),对我的书稿进行了耐心的修改;约希考·尼黑(Yoshiko Nihei)也是这样,她对第八章中的图片进行了负责任的研究,并提出了建议。最后,我还要感谢斯蒂芬尼·瓦达(Stephanie Wada)对本章书稿的最后审阅。她是杰克逊·伯克基金(Jackson Burke Foundation)的副管理员,也是日本艺术方面的专家。

查尔斯·贝弗里支(Charles Beveridge),《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论文集》(Frederick Law Olmsted Papers)的编委之一、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C.)的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的历史系教授,他审阅了本书的第九章。他为我提供了最有帮助的、关于奥姆斯特德和他的伙伴卡尔福特·沃克斯(Calvert Vaux)的成熟见解,超越了我长时间以来对

他们作品的理解程度。戴维·舒伊勒(David Schuyler)弗兰克林和马歇尔学院的美国问题研究教授，也是《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论文集》的编委之一，他对十九世纪美国大都市景观方面有独特的见解，并且他是安德鲁·杰克逊·道宁(Andrew Jackson Downing)、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研究的专家，他对于第九章及以后章节的审阅给了我一个新鲜的视角，这些领域，以前我虽然熟悉但是理解还不够细致深入。

戴维·斯垂特菲尔德(David Streatfield)，华盛顿大学景观建筑学教授，也是加利福尼亚州花园方面的权威，对于加州在景观设计史中扮演的角色，给了我极其重要的见解。我还要向唐纳德·布拉姆德尔(Donald Brumder)表达我的谢意，感谢他在我参观帕萨丹纳(Pasadena)花园时给予的热情接待，同时安排我参观了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的几处私宅。花园设计师威勒姆·沃茨(Willem Wirtz)带我参观了位于佛罗里达州(Florida)的棕榈海滩(Palm Beach)的几处公共和私人花园，很感激他给予的那个社区过去和现在景观历史的知识，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兰斯·奈卡尔(Lance Neckar)教授，明尼苏达(Minnesota)大学建筑与景观建筑学院(Collage of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副院长，他阅读了本书的第十三章，并就我对现代主义园林的总体看法作出了建设性的评论。伊丽莎白·G·米勒(Elizabeth G Miller)同样阅读了本章的一部分，而在我去印第安那州哥伦布市(Columbus)J·厄文米勒花园(J.Irwin Miller garden)以及几个相关的有趣地方的旅行中，威尔·米勒(Will Miller)是一位慷慨而且细心的东道主。《太平洋园艺》(Pacific Horticulture)杂志的编辑乔治·沃特斯(George Waters)，在我去加利福尼亚州索诺玛(Sonoma)的当乃尔花园(Donell Garden)以及相邻的现代景观参观时同样是一位出色的向导。我还要感谢高尔顿(Gordon)和卡罗尔·海雅特(Carole Hyatt)，因为在我参观伯克郡(Burkshire)的璠姆基格

(Naumkeag)时，他们给了我很大帮助。因为罗纳尔多·麦雅(Ronaldo Maia)的善意帮助，我去参观罗伯特·布雷·马科斯(Roberto Burle Marx)的几处现代主义景观作品时得到了学识渊博的巴西园艺学家辛西娅·赞诺托·萨尔瓦多(Cynthia Zanotto Salvador)的陪同，本书的第十三章对布雷的作品进行了探讨。第十四章得益于我到新落成的沃尔特·迪斯尼世界(Walt Disney World)的动物王国公园的参观，它位于佛罗里达州(Florida)的奥兰多(Orlando)，陪同我的是保罗·科姆斯托克(Paul Comstock)，他是迪斯尼公司幻想部(Imagineering division)景观设计的负责人。

当我写作第十五章的时候，艺术家南希·霍尔特(Nancy Holt)给了我一个采访的机会，这使我在概念上和技术上了解到了许多以景观为主的艺术品的建造过程。从她的身上我也更好地理解了她的丈夫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在大地艺术品(Earthworks)运动的起源中所扮演的角色。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同样热情地欢迎我到苏格兰(Scotland)邓福利郡(Dumfrieshire)的波特拉克花园(Portrack Garden)参观。我还要感谢该花园的首席园艺师阿利斯台尔·克拉克(Alistair Clark)，与他讨论了花园景观。同样，我还感激伊安·汉密尔顿·范德雷(Ian Hamilton Findlay)，因为他让我在他的位于苏格兰兰那克郡(Lanarkshire)的诗意的景观作品“小斯巴达”(Little Sparta)中度过了一个上午。

亨利·J·斯特恩(Henry J Stern)，纽约市公园与休闲局(Department of Parks and Recreation)两期连任局长，为局内职员注入了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乔那森·库恩(Jonathan Kuhn)，该部门的艺术与文物主任。他们解答了我对该局过去档案材料中存在的疑惑问题。同样需要感谢的是绿拇指行动(Operation Green Thumb)的前任负责人简·威森曼(Jane Weissmann)，还有公共土地基金(Trust for Public Land)的纽约市政土地项目(New York City Land Project)主任安德鲁·斯通(Andrew Stone)，他们为我书写第十六

章提供了社区花园运动的材料。

如果没有这些学者、设计师和管理者以及上述种种职业的人的耐心研究和深入探索，这本书的出版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景观设计史领域以及景观恢复方面所做的研究、出版和实践活动既是新鲜的，又是必要的。我聆听过耶鲁大学(Yale)的教授文森特·斯加利(Vincent Scully)和克里斯托佛·唐纳德(Christopher Tunnard)的讲座，他们的知识对我追寻建筑、景观、城市规划的热情起了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这种热情也来源于我与文化地理学家J·B·杰克逊(J.B.Jackson)的友谊培养起来的。查尔斯·麦柯拉弗林(Charles McLaughlin)把他的论文稿《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论文集》借给了我，当时我正在做关于《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的纽约》的研究工作，那个年代还没有复印机、计算机或者多卷的奥姆斯特德著作的系列出版物(这是他与伙伴历史学家查尔斯·贝弗里支一直在运作的事情)。无论是学术上，还是个人友谊上，我将永远感激他们。

另一些特殊的朋友包括：萨拉·采达尔·米勒(Sara Cedar Miller)，中央公园保护区(Central Park Conservancy)的历史学家和摄影师，当这本书初具雏形之时，她就给了我很多的帮助。还有雷因·阿多尼奇奥(Lane Addonizio)，我在城市景观学会(Cityscape Institute)的同事，在这本书的最后的出版工作中，她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萨拉的技巧支持，我就不能在这本书初具雏形时进行带幻灯片的演讲；没有雷因在此项目中对办公室的组织工作，我们也不能如期完成工作计划。我还特别感激鲁伊斯特·莫茨托拉斯(LuEster Mertz Trust)以及弗策摩尔(Furthermore)、J·M·卡普兰基金会(J.M. Kaplan Fund的出版项目)、萨缪尔·H·克莱斯基金会(Samuel H. Kress Foundation)、亨利·鲁斯基金会(Henry Luce Foundation)、尤金·R和克莱尔·E·肖慈善基金会(Eugene R. and Clare E. Thaw Charitable Trust)、查尔斯·伊文斯·休

斯纪念基金会(Charles Evans Hughes Memorial Foundation)；以及格拉汉姆美术高级研究基金会(Graham Foundation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Fine Arts)，感谢他们为本书的出版提供资金上的援助。

在中央公园的建造中我体会到了合作和团队的精神，在哈利·N·阿布拉姆斯出版公司(Harry N. Abrams Inc. Publisher)的职员们以及总编辑保罗·高特列伯(Paul Gottlieb)看到由我提议的调查的必要性时，这种精神更加彰显。他们允许此书可以根据图片和文字的数量来调整合同中已规定的版式。摄影与授权部主任约翰·克若雷(John Crowley)作为最有才智的图片编辑，在戴安娜·刚格拉(Diana Gongora)的协同帮助下提供了大量我无法找到的图片，并且他们仔细阅读了文稿，确保了图片和文字的配合准确无误。保罗·斯兹基(Paulo Suzuki)把他的艺术技能带到了我们的项目中来，以他前从文案工作为基础，绘制了大量的平面图和透视图，令读者得以形象化地看到书中涉及到的景观。高级编辑埃兰·班克斯·斯坦顿(Elaine Banks Stainton)指导了全书艰难的出版过程。安娜·罗杰斯(Ana Rogers)是本书的版式设计者，她的精美作品充分展现了她的才华。我们这个团队的领导人是朱丽娅·摩尔(Julia Moore)，她是本书的执行编辑和图书出版主任，也是编辑室中最富聪明才智的一位。她保证了图书出版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一致性，她总在强调出版本书最重要的目的是它的意图和内容，而不是方便或廉价。

我想在最后补充几句对我丈夫泰德的衷心感谢，正因为最初的不间断鼓励才令我担负起这次世界范围内的调查研究和坚持将其出版的工作。我特别感谢他与我分享了一份绝妙而有教益的体验：我们共同漫步于本书描述到的那些城市、公园和花园中，一同谈论那些包括了我们自己在内的人类文明。我们得出的意象和获得的场地设计知识都归功于此。



世界景观设计的历史必定是一部人类文化的历史。它基于与时空观相关的最广泛的观念来考察景观历史。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艺术的史学探究，试图论证其哲学理念以及美学思想。通过艺术加以表达自然和塑造自然。一部景观设计的历史是书写人类思想历史的另一种方法。因此本书在寻求展示一些特殊场景设计图时，还兼顾大量的文字描述。它试图把景观作为对宇宙、自然、人性的态度来阐释，企图展示景观如何与其他密不可分的艺术门类来共享艺术形式。这些艺术形式包括绘画、雕塑、建筑以及其他装饰艺术，同样还包括文学及其他思想意识的表达手法。因而本书叙述了人类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尝试给自然赋予秩序和意义，为不同的场所给予不同的表现形式以提高该地的显著程度。

在各个时代、各个地区，人类不同的态度表现在神话、传说、礼仪、社会结构以及经济利益的追求上面。这些事物又影响了空间的组织以及其内部设计的形式，然后又使文化习惯合理化和本能化。这样才能在此前提下限定文化而后成为一种盛行的共识的文化。起主要作用的社会精英、规划师、建筑师和景观设计师以及实践中的日常结构的建造者的决策思想和社会环境中的日复一日的使用物品经常被贴上哲学理念以及其在形式上表达的历史标签。相反，一种需要表达的哲学观念又可以用形体的方式预示出来。在这两种情况下，理念与文化表达之间差异的裂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不论是去理解还是去证实，设计总是能反映

一种文化价值观，包括那些哲学家提供给我们的观察宇宙和人类所在世界的独特的“镜头”。

本书中讨论的很多景观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人们只能靠考古学家提供的线索在精神上或形体上重塑它们。有的只是它们最初设计的一部分。另有一些景观则显示出一种穿越时间的持久力。还有一些——世界级的盛会地、主题公园、购物中心——是现时代的产物。所有这些都可以理解为文化价值观的不同表达形式。并且，由于景观所具有的暂时性的一维度时间特性，即随时间而改变，所以它们可以作为在自然强大动力和人类强烈的改变自然的欲望中年复一年地刻下历史文稿(Palimpsests)，让后人来解读历史。

文化，作为政治、经济、技术环境以至于宇宙观和哲学思想的因与果，每一个时期、每一个国家都留下了它独特的遗产，还基本上表明了它的政权类型、富有程度以及建筑技术水平，甚至政治特点和宗教信仰。所有这些都通过业主的爱好和设计者的智慧以某种景观形式表现出来。实际上，在没有哲学思想统一指导的政权、财富和技术的具体组合情况下，很难以同一种形式表现出业主的爱好和业主的智慧，他们的景观效果也不可能以同一种形式和图像内容表达出来。比如：我们可以说，伟大的十七世纪景观设计师安德烈·勒·诺特(André le Nôtre)的作品不仅表达了路易十四(Louis XIV)的皇权权威，还体现了在财政大臣让·巴蒂斯特·科尔伯特(Jean Baptiste Colbert)统治下的法国经济的强盛，并且运用了军事工程师塞巴斯